

瞿秋白：“肯用脑子想问题”

人物春秋 瞿秋白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而且学识渊博，才华横溢，广泛涉猎政治、哲学、翻译、文学、艺术和史学等诸多领域，笔耕不辍，给我们后人留下了500多万字的著作、文章和译作，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毛泽东指出：“瞿秋白同志是肯用脑子想问题的，他是有思想的。”

一天不读，一天不想，就心上不舒泰

家庭环境对一个人成长的影响是潜移默化且深远持久的，特别是青少年时期。瞿秋白出身于有“世代读书，也世代做官”传统的瞿氏家族。瞿秋白的母亲金璇接受过良好的教育，颇通文墨，从小的时候就开始教导他习读古文诗词，寄予厚望。生长在这样的读书氛围里，瞿秋白自幼读书就非常刻苦，养成了勤奋好学的良好习惯，并贯穿了其一生。上学后，他常常把书带在身边，有空就看看几页，并随时记下所思所悟。在北京俄文专修馆读书期间，他除了完成正常的学习任务外，还制定了自修计划和每天自学进度，并严格执行，完不成计划进度就不休息，为此常常学习到深夜。1920年，瞿秋白应北京《晨报》之聘，赴苏俄采访。由于旅途劳累过度和生活困顿，他的肺病日益严重，不得不住院治疗。即使如此，他仍然坚持学习和工作，起不了床，就躺着看书，

趴在枕头上写作，他讲“我一天不读，一天不想”，就心上不舒泰。”瞿秋白多年如一日的勤学苦读使其积蓄了深厚的理论修养和文学修养，为他更好地从事革命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党成立初期，亟需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为此，瞿秋白夜以继日，辛勤笔耕，先后编写和翻译多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还撰写了大量政治理论文章，予以宣传推介，并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探究中国国情，提出和分析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方式以及无产阶级领导权、工农联盟和武装斗争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为党的理论建设做了大量奠基性、开拓性的工作。1931年，由于王明等人的诬陷打击，瞿秋白解除了中央领导职务。面对逆境，他忍辱负重、委曲求全，开始转战革命文化战线。他“一如往常……每天工作和学习的时间总在十几小时以上，而且总是按部就班，有条不紊。早晨起床后先看报，几份大报看得很仔细，看到有用的材料就剪下来或摘录。上午剩下的时间一般是写文章；下午睡一会午觉起来就翻译和写作；晚上是看书或写作。他习惯于晚上工作，很晚才睡。”在这个时期，他创作和翻译了一大批文艺理论和文学作品，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对各种各样的反动文艺思潮进行坚决反击，积极引导、推动左翼文化运动发展，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

做一个中国人，起码要懂得中国的文学、史学、哲学

凡是和瞿秋白接触过的人，无不钦佩他的博学多识。受家族浓厚学习氛围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熏陶浸润，瞿秋白学习兴趣广泛，视野开阔。“十六七岁时开始读了些老庄之类的子书，随后是宋儒语录，随后是佛经，《大乘起信论》——直到胡适之的《哲学史大纲》、梁漱溟的《印度哲学》，还有当时出版的一些科学理论、文艺评论。”他对朋友讲：“我们做一个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起码要懂得中国的文学、史学、哲学。”基于此种认识，瞿秋白严格要求自己，刻苦攻读文史哲等社会科学文化知识，强记博闻，汲取尽可能多的精神营养丰富自己。瞿秋白讲：“中国的旧书，十三经、二十四史、子书、笔记、丛书、诗词曲等，我都看过一些……我是找到就看，忽然想起就看。”郑振铎在《记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一文中回忆“秋白在我们几个朋友里面……中国书念的最多，并大量刻苦读着哲学书……对于他的博学和思想深刻，是十分佩服的。”根据革命工作需要，瞿秋白曾在上海大学任教，他的渊博睿智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当时的学生杨之华回忆瞿秋白讲课的情景：“他为了使大家明白，引证了丰富的中外古今的故事，深入浅出地分析问题。”他当时的另一个学生丁玲

也曾回忆“最好的教员却是瞿秋白。他几乎每天下午课后都来我们这里……他谈话的面很宽，他讲希腊、罗马，讲文艺复兴，也讲唐宋元明。他不但讲死人，而且也讲活人。他不是对小孩讲故事，对学生讲书，而是把我们当作同游者，一同游历上下古今，东南西北。”在苏俄工作期间，瞿秋白不仅“研究俄文、俄国史、俄国文学史；同时……也很用心看俄国共产党的报纸、文件，调查一些革命事迹”，对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洗礼，进而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毕生信仰和追求，以自己的亲身见闻向中国人民介绍俄国革命的实践，热情地讴歌十月革命，并将《国际歌》翻译成中文，传唱至今。

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

瞿秋白强调，写文章要让人能读得懂，看得明白，开卷有益。要“向大众说人话，写出来的东西也要念出来像人话——中国人的话”，要“说得清清楚楚，头头是道。要写就怎么写，叫人家读起来，就等于说起来可以懂得。写的时候，说的时候，把你们的心，把你们真挚的热情多放点出来，不要矫揉做作”。为此，他在主持《向导》《热血日报》等党报党刊编辑工作时，特别注意报刊文风的通俗朴实，在内容上尽量贴近普通群众的生活、反映群众

的心声，稿件撰写上尽量采用浅显易懂、大众化的语言，文章观点开宗明义，篇幅尽量短小精悍，真正让普通群众能读、能听、能说。他在《谈谈工厂小报和群众报纸》中讲：“一定要用口头读出来普通工人可以懂得的话来写……用真正的白话，而且是浅近的话，每一次用到新名词一定要顺便解释；句法要简单、明了、短促，代名词要确切、清楚，如果不能，那么，宁可多用几次名词；缩短语越少越好。”瞿秋白主编《热血日报》时，专门开设副刊《呼声》，下设杂感、小言、杂件、诗歌和歌曲等普通群众喜闻乐见的专栏，采用了不少民间文学形式，如十二月花名和京调等，并且经常刊登群众的来信来稿，编辑修改文稿时，他也尽可能地使用口语、方言。他创作的《救国十二月花名》，就以孟姜女调的形式热情歌颂了工人群众顽强战斗、不畏强暴的革命精神，深受群众欢迎。《热血日报》共出版24期，瞿秋白先后撰写了21篇社论、时评和23篇杂感、小言，这些文章说理生动形象，语言犀利简洁，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瞿秋白的一生虽然短暂，但他始终忠诚于党的事业，呕心沥血、勤奋耕耘，给我们留下了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正如毛泽东在《瞿秋白文集》题词中所说：“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 □高冬梅

古代也有“脱口秀”



东汉击鼓说唱俑。

还有点差别，倒更接近于脱口秀的形式。

三国隋唐：层出不穷的“段子高手”

三国时期俳优表演更加受欢迎。《三国志》援引《曹瞒传》记载：“太祖为人佻易无威重，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笑大笑，至以头没杯案中。”以奸雄形象著称的曹操竟然将头没入杯案之中，可见表演的“笑”果之好。刘备初据成都时，诸事草创，手下的许慈和胡潜互不服气，经常争斗。为此刘备专门在宴会上让俳优扮演成两人的样子，互相争论打斗，通过引起大家发笑来感化他们。

当时，已经成型的表演内容有“说肥瘦”“弄愚痴”等，主要还是以调侃人的生理缺陷为主，并不文雅。不过，此时已经有了专门的“段子手”和成熟的“段子集”。邯郸淳所著的《笑林》，是我国最早的笑话专著。三曹父子都是邯郸淳的粉丝，曹操初见邯郸淳的时候，亲自“诵俳优小说数千言”，以表达自己对俳优的喜爱。

隋代的秀才侯白也是个段子高手。《北史》记载他“性滑稽，尤辩俊”，《太平广记》中收录了不少有关他的笑话，其中许多段子如今依然流行。有一次他陪权臣杨素聊天，杨素问他：如果你掉进了一个数百尺深的坑中，你要怎么办出来呢？侯白说：别的不用，只要有一根针就可以。杨素问：用针干什么？侯白答：用针刺我的头，让头里的水出来将坑灌满，我就可以浮水上来了。杨素又问：你的头里哪来这么多水呀？侯白说：如果没进那么多水，怎么能掉到那么深的坑里？（“若无尔许水，何因肯入尔许坑？”）侯白所言，既巧妙地回应了问题，又暗指杨素提这个问题纯属刁难，没有实际意义，可谓机智。

唐代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思想开放，为搞笑艺人的存在提供了丰厚的土壤。这一时期的俳优艺人往往兼通歌舞、音乐、戏剧、杂技等多项技艺。《乐府杂录》记录当时著名的俳优艺人就有黄幡绰、张野狐、李仙鹤、曹叔度、刘泉水等多人。当时的俳优表演已经有了较为固定的范式，类型包括参军戏、弄假妇人、弄婆罗门、弄孔子等等。其中参军戏一般为双人，有点类似于现在的相声，而“弄假妇人”则是男扮女装的反串表演。

除了正式的表演，即兴的发挥同样重要。据传，有一次唐玄宗与诸王宴会，宁王吃饭的时候不小心“错喉”（吃呛了），一下喷到了唐玄宗的胡子上，这可把宁王吓得不敢。侍奉在旁边的优人黄幡绰赶忙说，宁王这不是“错喉”，是“喷帝”（谐音喷嚏），引得大家哄堂大笑，机智地用“谐音梗”化解了尴尬。

宋代：“说话”成为一门艺术

到了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文化的繁荣，促进了幽默表演向民间的发展。《鸡肋篇》记载，成都西园开园的时候，“酒坊两户，各求优人之善者，较艺于府会……环壁皆府官宅看棚，棚外始作高凳，庶民男左女右，立于其上如山。每淫一笑，须臾中哄堂，众庶皆嘘者，始以青红小旗各插于垫上为记。至晚，较旗多者为胜。”宋代的喜剧比赛，全靠观众的笑声投票，哪边的表演能赢得哄堂大笑，就可以得一分，绝对公平合理。

宋代还兴起了一种“说话”表演，类似于现在的说书，讲述的内容主要包括传奇故事、历史故事、公案故事、佛教故事等。此外还有一种“说话”的内容是“说诨话”大约应是一种搞笑表演，与现在的脱口秀相似。宋代的“说话”演出，大多在瓦舍勾栏中举行。

瓦舍又名瓦子、瓦市、瓦肆，是一种集商业饮食、娱乐为一体的综合娱乐场所。《梦粱录》中说：“瓦舍者，谓其来时瓦合，去时瓦解”之意，易聚易散也。”勾栏是瓦舍中用栏杆和绳子围起来的演出场地，相当于现在的露天剧场。所以宋代的“脱口秀”表演已经有了专门的演出场所。

明末清初时期，出了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民间说书艺人——柳敬亭。柳敬亭原本姓曹，因早年犯法改姓柳。他说书艺成以后，辗转扬州、杭州、金陵各地，所到之处，深受观众的欢迎，也得到了许多文人墨客的认可。张岱的《柳敬亭说书》中描述他说书时：“主人必屏息静坐，倾耳听之，彼方掉舌。稍见下人咕哝耳语，听者欠伸有倦色，辄不言，故不得强。”“发现观众听得不认真，就停下不讲了。而他一旦说起书来，‘其疾徐轻重，吞吐抑扬，人情入理，入筋入骨’，‘其描写刻画，入微毫发，而又找截干净，并不唠叨。”据张岱记载，柳敬亭“一日说书一回，定价一两。十日前先送书帕下定，常不得空。”可见其表演技艺之高超，赢得了人们的热烈追捧。此时的说话艺术，早已超越了单纯的“搞笑”，转而以跌宕的情节、精湛的表现取胜了。 □刘疆

钩沉

几部辞典中“飞蓬”释义与例句之失误

在吾陕关中，青（黄）蒿简称青蒿，其与蓬蒿的不同，老幼咸知。二者虽都是春荣而秋枯，然而有别。青（黄）蒿是直茎高五六十厘米左右，春到秋，青到黄，黄而枯，枯而秆犹直立，待渐渐于朽，可谓是生于斯，长于斯，而又老于斯不易地也。难怪有一首关于还别人钱的诙谐顺口溜中，就涉及到青（黄）蒿的内容：“要还你的钱，等到那（音耐）一年。那（音耐）一年，山里的黄蒿长成林，解成板，打成船，放到江里游几年……”能解板，自然那杆材要端正的。

而蓬蒿则不然，它的杆茎是弯曲状，但不像无力卧枝的蔷薇，也不像攀别枝生长的藤，而是虬曲而上，独立生长，枝条旁逸斜射，植株整体呈椭圆形，较青蒿稍高。秋枯后，根秆朽，所以在冬季或来春，尤其是季冬初春时，大地上，或寒风袭人，或“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以息相吹也”，这时刮风，蓬蒿也是大者根拔随风翻卷而去，小者则被刮离地面，我在幼童时和小伙伴游戏时，还追赶来飞蓬为乐事。

后来长大了，见《荀子·劝学》所比喻的“蓬生麻中，不扶而直”，就是说如果蓬蒿生在挺直的麻田中，不用扶着扶持，其杆茎自然端直。唐人李华《吊古战场文》中的“蓬断草枯，凛若霜晨”，知道那是古人对蓬蒿茎曲和根枯细心观察的结果。古人诗中，用此意象者不少。如王维“征蓬出汉

塞，归雁入胡天”，使至塞上也；李白“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言与好友杜甫分别也；高适“行子对飞蓬，金鞭指铁骝”，送李侍御赴安西也；最是曹子建“转蓬离本根，飘摇随长风”，用以自伤，尤典型也。这也正是蓬蒿特征用得正确的范例。

到今天，几部权威辞典对“蓬”字的释义和所用例句却令人犯懵。《现代汉语词典》：“①飞蓬，②蓬松，③量词。对‘飞蓬’又作这样的解释：‘多年生草本植物，叶子像柳叶，边缘有锯齿。秋天开花，花外围白色，中心黄色，也叫蓬。’

此“飞蓬”未涉及蓬蒿，自然与文史中真正意义上的“飞蓬”相距甚远。《现代汉语词典》对“飞蓬”条释义的缺失，可为一憾。

《辞海》“飞蓬”条下有两种义项：①蓬，蓬草，枯后根断，遇风飞旋，故称飞蓬。②植物名。（与《现代汉语词典》略同，不赘）

这较《现代汉语词典》而言，是将蓬蒿草的“飞蓬”说清楚了，但可惜对蓬蒿的例句却用错了。其例句为《诗经·卫风·伯兮》：“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将该句用在此处就使人愕然了。莫非诗中那“为王前驱”的征人被斩，首级随风而滚？显然并非如此。该诗是女子思念为国东征的丈夫而作。“伯”，长兄，哥哥。此处系妻子对丈夫的称呼。这两句写丈夫东征后，女子（妻子）在家愁绪不整，头发

蓬乱，无心修饰的意思。程俊英《诗经译注》中的译文就是：“自从哥哥去征东，无心梳理发蓬松。”《辞海》错用例句，再为一憾。

好在《辞源》对“蓬”字解释得最到位，在“蓬”字条下直接标出：①草名。蓬蒿。秋枯根拔，风卷而飞，故又名飞蓬。终于见了“蓬蒿”，这较《辞源》要查“蓬蒿”在“蓬”字下查不着，还须要到“飞蓬”条去查而直截了当了。然而在例句中，却与《辞海》用了同一例句，当然也犯了同一错误。按理讲，这个例句放在其解释“蓬”字的第②句下“蓬松、纷乱。”当谓合适。又为一憾。

至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唐诗选》中，在对李白《梁甫吟》中句：（高阳徒郢食其）“东下齐城七十二，指挥楚汉如旋蓬。”“旋蓬”也就是飞蓬。而其对“旋蓬”却作了这样的注释：“‘旋蓬’，蓬草遇风就连根而拔，随风飘转。这里比喻郢食其指挥楚汉之争如转动蓬草一样容易。”其注释的硬伤就是“蓬草”二字后而少了两个字：“枯后”。蓬草若在生时，或是秋天其根未枯，风对蓬还是无可奈何的。在此一并提起，复为一憾。

三部权威辞典，一部权威选本，对“蓬”字的释义或例句都出现了失误，不能说不是一小憾。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引为小憾，憾虽小，还是憾焉。

□杨乾坤

语林指瑕

《西行漫记》秘密出版前后

斯诺磋商，力求准确达意。

斯诺还将版权无偿赠送给了胡愈之。他在为此书写的序言中表白：“复社是由读者自己组织起来的非营利性质的出版机关。因此，我愿意把我的一些材料和版权让他们，希望这个译本，能够像他们所预期的那样，有广大的销路，因而对于中国会有些帮助。”

关于中文译本的书名，胡愈之再三斟酌用心良苦，是因为考虑到其时日寇视共产党为死敌，国民党当局对中共尚未正式“解禁”，以原名《红星照耀中国》出版的话，这“红星”两字就会引人注目，于发行大有影响，于读者也不安全。为掩敌耳目，他最后敲定，把书名改作《西行漫记》，乍一看，还以为是一本游记。

半年多时间里，《西行漫记》重版了5次，印数高达8万余册，盗版本更是不胜枚举。其时国共已重修旧好携手抗战，有的国民党官员也对《西行漫记》产生浓厚兴趣，他们有心了解共产党的真面貌，故而争相买来阅读。

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西行漫记》，就是根据当年胡愈之主持出版的《西行漫记》书名下，加上“原名：红星照耀中国”。□茂钦

往事